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东南亚学研究： 回顾与展望

梁志明 张锡镇 杨保筠

在跨入新世纪之际，广大东南亚研究会的会员都关心今后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关注研究会将以何种姿态进入新的世纪。在建会 22 周年的时候，我会近百位会员代表欢聚在北京，举行第六届年会，并以“世纪之交的东南亚学研究——回顾与展望”为题开展研讨，这是一次对中国东南亚研究进行总结和前瞻的大会。借此机会，我们拟简略回顾 20 多年来我国东南亚学研究的进展、成就和问题，并对今后的发展作一点展望。我们将这些很不成熟的看法和意见提出来，以期抛砖引玉，请代表们讨论并匡正。

一、中国东南亚学研究的回顾

在我国地区与国别的研究中，东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一直是研究基础较好、研究力量较强，而且成果较多的一个领域。东南亚与中国是近邻，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研究东南亚的传统，中国保存的“浩如烟海”的古籍堪称对东南亚历史、地理、经贸、宗教与文化研究的“无价之宝”。20 世纪初叶，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进入了有组织的阶段。1928 年，上海暨南大学成立“南洋文化事业部”后，1940 年又在新加坡建立“中国南洋学会”。它是中国学者，包括侨居新加坡的华人学者建立的研究团体。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东南亚研究获得新的发展，迈入更有组织的时期。北京和各地，特别是南方诸省研究东南亚的学术机构相继建立。到“文革”前，在朱杰勤、韩振华、姚楠等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已颇具规模并拥有了一支精干且颇有水平的队伍。在东南亚历史、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南洋华侨史以及南海古籍文献的考证、校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十年“文革”使中国东南亚研究备受摧残，各项研究工作陷入停顿。从改革开放以来，

收稿日期：2001 - 12 - 10

作者简介：梁志明（1935 - ），男，湖南长沙市人，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锡镇（1947 - ），男，河南沁阳县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保筠（1950 - ），男，河南孟县人，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副教授。

中国东南亚研究进入空前飞跃发展的崭新时期。1979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标志。20多年来东南亚学研究的进展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研究队伍壮大。改革开放前，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专业学术团体不过5、6家，到90年代末已拥有10多个专业研究或含东南亚研究内容的学术机构，并有一些民间学术团体以及非实体的研究中心。研究队伍人数达到600余人。研究机构分布广泛，大致分属5个系统：以高等院校为主的教育部系统；以中国社科院为首的各地社科研究所系统；国务院部委与侨务、新闻出版部门系统；党的部门和党校系统；军队系统。到目前为止，我会的会员较多地集中在前两个系统。从80年代起，我国开始培养研究生，年轻一代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归国留学生加入研究行列，逐步形成老中青三结合，以中青年为主体的研究结构的队伍。新一代的研究专家崭露头角，为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

（二）研究成果显著。80—90年代以来，中国东南亚研究不仅在成果的数量上超过了“文革”前的20多年，而且研究的范围空前扩大，质量日益提高。从互联网上查询到的讯息，1990年至今，北图和北大图书馆馆藏的东南亚的各类著作共达607部。研究领域不仅限于历史等人文科学方面，而且已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教育、军事、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等方面，其中一些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泰族起源问题、南海史地考证、华侨华人企业研究与华侨华人大型工具书的编撰等）。科研成果种类齐全，既有专著、论文、教材、译著和译文，又有丛书、古籍整理、资料汇编以及手册、概览、词典、百科全书和目录索引等工具书；科研方法与时俱进，研究视角与层面日益多样化。不少学者坚持把理论与实际、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既继续进行素有根基的国别研究和专业研究，又开展了综合性整体研究和区域性研究。学者们特别是青年专家努力吸收国际前沿研究成果，采用多学科的理论、比较研究或定量分析的方法以及口述调查方式进行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使用电脑搜集信息、资料和写作。经过长期培训并刻苦攻读东南亚学方向的一些博士生的学位论文，以其视野新颖、资料翔实，获专家们肯定，为我国东南亚学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

90年代以来，中国涌现了不少有较高质量和水平的东南亚科研成果，我们了解很不全面，仅列举以下一些代表性著作以供参考：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当代东南亚政治》、《东南亚的区域合作》、《从东盟到大东盟》、《东南亚华侨华人企业集团研究》、《东南亚华侨通史》、《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菲律宾史》、《近现代东南亚》、《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东南亚历史词典》、《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等。此外，还有东南亚丛书、专题研究专著、学者论文专集与古籍史料汇编，以及外国名著翻译，等等。

（三）学术交流发展。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会成立后坚持增强学术研究与合作交流的宗旨，相继在厦门、昆明、广州、南宁、海口召开了五次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同时主办或协办了十余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各地学会组织也举办了一系列专题性研讨会。例如1990年在云南召开的第四届泰国学国际会议，1990—1997年，在桂林、昆明、成都、贵阳、重庆相继召开的中国西南开放与东南亚研究国际

研讨会。1997年海口第五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后,1999年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在广州举办了庆祝研究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等在南宁召开中越建交五十周年纪念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由北大东方学研究院与新加坡南洋学会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面向21世纪的东南亚”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9月又由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和南洋学院主办了“21世纪初的东南亚经济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各种会议规模不同,形式多样。厦大、暨大、中大、云南与广西的东南亚所的东南亚学术刊物和研究会委托郑州大学历史学系越南研究所承办的《会讯》多年来坚持定期出版,有力地促进了学术信息和研究成果的交流。

近20余年来,中国大陆学者纷纷走出去,赴境外、国外参加会议,访问、讲学、留学和进修的也日益增多;同时中国大陆从事东南亚教学、研究的学校、研究机构与海外的合作交流日益频繁。许多海外学者,包括华人学者应邀来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或协助指导研究生,打破了“文革”前多年封闭的状态,大大推动了我国东南亚学的发展。

不过,与国际先进的研究水平相比,与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科学研究多出精品要求相比,当前我国的东南亚研究在理论、方法与组织等方面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下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二、中国东南亚学研究的差距与问题

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西方用近代科学理论与方法对东南亚进行研究有较长的历史。西方的东方学过去主要是指“印度学”和“汉学”,东南亚研究长期从属于“印度学”和“汉学(即中国学)”。随着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制度的确立,西方国家加强了对东南亚的研究。它们成立了研究机构,开展了调查研究,出版了书刊,并有了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二战前,西方的研究是以人文科学为主,包括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地理学,文化史与文明史构成重要内容。西方学者用科学的方法,开展考古发掘、田野调查和碑铭考证,进行史地考据、校勘与译注,取得不少成绩。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对东南亚地区作整体考察和研究。1902年,德国考古学家弗朗兹·黑格尔(Frans Heger)出版了《东南亚古代金属鼓》,将所收集的东南亚地区的古代铜鼓进行分类排队,创立了“黑格尔分类法”。1923年,奥地利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海涅·革尔登(Heine Geldern)撰写了关于东南亚的民族和文化的著作,指出了东南亚各民族在人种、语言和文化方面有共同联系,阐述了他们的迁徙和彼此的影响。这是一部将东南亚作为整体考察的重要著述,由此,有些西方学术界人士将革尔登尊为东南亚学的创立者。

二战期间和战后,东南亚作为一个地区的名称日益推广,东南亚学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正式形成,且日益繁荣兴盛。战后东南亚学研究出现了不同的特点:一是研究重心由英、法为主的西欧国家转移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是美国研究东南亚的重要基地;二是研究内容从战前的文明史、文化史为主转向以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研究为主;三是区域研究与世界整体性研究日益加强,人们的视野不限于一个国

家,甚至一个地区,而扩大到从全球的整体来观察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战后西方学者出版了一系列东南亚地区性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的著作,把东南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进行综合研究成为一种时尚。以史学为例,战前西方学者往往以国别史为研究对象,战后出版了多种东南亚地区通史和专题论著。其中首推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尔(D.G.E. Hall)于1955年出版的《东南亚史》。这部西方关于东南亚历史的权威著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数次修订再版。霍尔的重大贡献是坚持东南亚的统一性和自主性,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性研究。他批判东南亚研究中的“欧洲中心”、“印度中心”等倾向,卓有见地地提出:“看东南亚历史,要以其自身的观点而不能有其他观点”的新颖见解。美国学者约翰·F·卡迪(John F. Cady)1964年出版《东南亚历史发展》,1974年又出版《战后东南亚史》。在上下两部相连的东南亚地区通史中,作者既对东南亚历史作了颇为全面的综合考察,又对各国发展的不同特点作了分析。全书以近现代史为重点,一直撰写到70年代越南战争临近结束的时期,内容侧重对经济、政治、社会与国际关系的阐述,体现了当代美国新史学的思想。卡迪的这两部书不仅从经贸以及宗教、文化等方向阐明东南亚地区的相对统一性与相互关联性,而且反映了东南亚各国的多样性特点。

有关东南亚地区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还有乔治·戈岱司的《东南亚的形成》、戴维·乔尔·斯坦伯格的《东南亚探索》、J. M·普卢维勒的《从殖民地到独立的东南亚》、J·巴斯廷和H. J·本达的《现代东南亚史》和卢西恩·W·派伊的《东南亚政治制度》等等。

自东亚地区经济迅速崛起以来,特别是80年代后,东盟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东亚奇迹”出现的原因,研究东亚国家的发展战略与模式,讨论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东亚发展中的作用。围绕这些问题各国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著作。1997年东南亚首先开始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对东南亚发展及其问题与教训的注意。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克曼(Paul Krugman)关于东亚经济奇迹的质疑与评论引发了一场东亚发展模式的讨论热潮。

近些年来,国际学术界提出从全球视野重构世界发展图景的问题,尼古拉斯·塔林(N. Tarling)在1992年主编的《剑桥东南亚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对东南亚历史地位和经济贸易的发展作了新的评价,认为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对于1600年以前的整个世界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98年,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G. Frank)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一书中,考察了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发展,对亚洲,包括东南亚的经济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历史地位作了重新估量,这本书被认为是一部对“欧洲中心论”的正统观念发起挑战的开拓性著作,也引起了热烈的评论。

战后时期国际学术界关于东南亚研究的又一重大进展是研究方法的丰富与发展。战前东南亚的研究以实证、考据为主,而战后西方关于东南亚的研究转向重理论、重分析、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日渐流行。学者们试图运用新的概念、新的架构,采用新的方法,(如计量分析、比较研究等),已不限于单学科的研究而是多种学科交叉与互相渗透,使研究领域视野拓宽,风格不一,现实感和可读性大为增强,从而涌现了一批有创见的成果。这是

当代世界东南亚学研究的特色。

战后日本、澳大利亚的东南亚研究，以及东南亚国家自身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发展。日本在战前将东南亚研究作为日本的“东洋学”的一部分，从20世纪20—30年代起对东南亚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全面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有水平的著作。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建立了密切的特殊关系，日本对东南亚研究极为重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均设有东南亚研究机构，亚洲研究所是日本研究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的重要中心。澳大利亚在近10余年来日益关注亚太地区的发展。东南亚研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研究发展迅速。澳大利亚的太平洋学院和多所大学都建有颇具实力的东南亚研究中心。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学术水平均达到国际前沿的高度，拥有一些国际知名学者。东南亚国家独立后，在建设民族国家过程中，十分重视本国历史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各国东南亚研究机构纷纷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已发展为国际上重要的东南亚研究中心。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越南河内国家大学和菲律宾的马尼拉大学等均十分重视本地区和本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

从中国国内研究东南亚的现状来看，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扩大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整体研究水平已有长足的进步和提高。香港回归后，以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力量的加入，使中国东南亚学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和东南亚局势发生了巨变，包括东南亚10国的“大东盟”形成，东南亚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空前改善，进入最好的历史时期。中国对东南亚的研究更为重视。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引起了我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关注，并掀起了研究东南亚的高潮。进入新的世纪，中国东南亚学研究虽取得了国内外公认的成绩，但从总的发展水平看，我国东南亚研究仍跟不上当代世界飞速发展变化的形势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急迫要求，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较仍存在不少差距、薄弱环节和问题。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1、中国东南亚研究虽改变了过去重文史而轻现实政治、经济的状况，东南亚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已成为教学和研究的重点，但除政府所属系统人力较多，资金较足，力量较强外，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力量仍较薄弱，而历史、语言、文化研究等传统强项领域、则普遍存在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现象，一些东南亚的古文字如越南的喃字等鲜有年轻学者掌握，这是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

- 2、中国东南亚研究仍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国内各研究部门和机构缺乏联络、通气，研究课题和成果相互重复，经费不足，加上研究人员的理论水平、语言和业务能力的限制，以及出国考察和进行实地调查条件的困难，有些研究存在着“闭门造车”的现象。学术成果与国际前沿差距甚大，而我们的对外学术交流仍有不少问题：请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参观访问的多，深入调研的少。我们的一些学者甚至未能访问自己长期研究的对象国家，因而难以及时了解和深入掌握国外学术研究的最新信息与先进成果。

- 3、中国东南亚研究领域存在着理论架构薄弱，综合研究水平欠缺，个案和实证研究不足的情况。近些年来我们的著述出版数量约以年均50部的速度增长，但高质量的精品并不多。在东南亚历史研究方面，我们仍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迄今由我国学者编著的东南亚国家的国别史还没出齐，也未能出版一部有质量的从古至今的东南亚通史。一些东

南亚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未提到研究日程上来。在东南亚现状的研究方面，客观上还存在某些条条框框的限制，例如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内政、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等等，仍难于找到原始文献资料，出版也有困难，这使东南亚政治与现状的研究难免与现实脱节，与经济研究相比往往处于较滞后的状况。

此外，我们的研究，尤其是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论述与结论常常是政府的政策注释和声明的重复，宏观议论多，而实证研究与具体分析少，回顾历史背景多，阐明发展前景少，缺乏理论深度和对前景的预测力，因而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4、我国一些有条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先后建立了与东南亚有关的硕士点和博士点，设立了包括东南亚研究在内的博士后流动站，并开设了一系列的学位课程，但东南亚的教学和研究仍存在薄弱环节。一是缺乏经验交流与合作，各高等院校的教学单位很少在一起开会研讨东南亚教学问题，包括教学计划、研究生培养等；二是还没有一套较高水平的教材；三是东南亚课程未列入大学本科教学方案，而本科教学是研究生的生源所在，关系到今后东南亚专业方向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5、出版难仍是制约东南亚研究的一大问题。我国出版物的发行渠道仍不畅通，许多东南亚的书籍出版没有进入国家出版（新华出版社）的发行网，而东南亚研究界的内部发行与交流渠道也不够畅达。郑州大学的会刊编辑部做了不少东南亚书籍评介和协助发行的有益工作，但学会会员之间的研究信息与成果的交流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总之，东南亚学研究的业绩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上述差距与问题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得力措施，将我国东南亚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中国东南亚学研究的发展前景与努力方向

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刻，中国的东南亚学研究既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又适逢新的发展机遇。

21世纪到来时的世界形势和东南亚地区局势又有新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深刻影响了当代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浪潮推动下，东南亚的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和区域合作进程加速。但新的矛盾和冲突的根源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威胁着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和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也严重影响地区的安宁和发展。

上世纪末冲击东亚和其他一些地区的金融危机在短暂复苏后，没有出现新的繁荣，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东南亚经济重又陷入滑坡境况之中。今年在美国所发生的“9·11事件”和美英对阿富汗的攻击，对亚洲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东南亚地区内原有的各种矛盾，政治冲突、领土领海争端、宗教与民族分歧、地方分离倾向以及东盟一体化过程中各成员国之间的利害关系等等，都是影响东南亚地区发展的因素。印尼政局的动荡不宁和菲律宾恐怖绑架事件的层出不穷表明，我们所研究的这一地区的局势仍然很不平静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在新世纪之初虽尚属稳定，经济、贸易与文化以及外交关系仍在发展，但制约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华人华侨问题、南海诸岛主权争端和经贸领域的矛盾

与竞争依然存在。

所有这一切向中国东南亚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并告诉我们,新世纪的东南亚学研究任重道远!

一门学科的兴衰,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为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认清形势,统一认识,总结经验,采取措施,加快我国东南亚学研究的步伐。借六届年会召开的机会,我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大力提高研究质量,树立精品意识。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科研成果的选题和研究力量的配置必然受市场机制的影响,在商品大潮冲击下,学术风气也会受到影响。但研究工作中急于求成、虚夸浮躁、抄袭作假等现象却是必须警觉的问题,它极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也阻碍了队伍的优良素质的养成。我们的研究既存在许多待开拓和需填补空白的领域,更缺乏高水平的精品之作,尤其缺乏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第一流的传世之作。为此要坚持“双百”方针,鼓励创新,提倡不同观点的争论,大力开展健康有益的学术评论,我们的学术才能繁荣昌盛,才会不断产生高水平的优秀著作。

第二、努力提高理论水平,提高外语水平和现代科研能力,是赶上和达到国际前沿的学术水平的关键。为此我们的研究须坚持“重视基础研究,加强应用研究”的战略方针,将宏观研究与微观考察密切结合起来,既善于从全球的整体视角探索东南亚的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又能充分发掘和掌握第一手资料,进行实证阐述与个案考察。研究课题应具有前沿性、开创性、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应在摸清国内外学术动态的基础之上设计,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雷同。

外语是研究工作的工具和学术交流的桥梁,我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有待于外语的培训。特别是双语种的培训,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大语种的水平,让年轻一代的学者能够自由地和外国学者进行对话交流,同时必须重视培养掌握东南亚国家语言的小语种人才,并采取紧急举措,让濒临失传的某些东南亚国家的古文字继承下来。

第三、加强国内各研究机构的协作,加强与境外、国外东南亚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一是要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会,特别是中小型的专题性的国际研讨会,例如中外学者研讨越南学的国际会议、青年学者参加的专题研讨会。这样的会议,问题集中,主题明确,更有实效;二是坚持办好学会的会讯,同时创造条件,争取创办一份全国性的东南亚研究的核心刊物,在条件具备后再办一份面向国外的英语学刊;三是要大力加强大学、社科院所系统与政府和部队系统的合作,邀请更多的党政军部门的研究人员加入研究会。四是邀请更多的前驻东南亚国家的使节、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参加学会的活动,让他们在退下来后从事东南亚研究工作,利用他们掌握的资料著书立说,撰写回忆录,将一些第一手的、鲜为人知的资料公诸于世,这将大大有助于我们的研究。

第四、在学会会员较集中的城市和地区设立研究会的分会、分部或联络处,在进一步发挥学会秘书处的协调、联络作用的同时,为加强各地的学术交流与协作,可设立研究会的分支机构以发挥地区分会的积极性,广泛吸引各地更多的东南亚研究人员参加研究会的活动。

为促进国内东南亚出版物的交流,有必要建立全国性代销网络。这可由各地研究会分会负责在北京、上海、厦门、广州、南宁、昆明和郑州等城市逐步设立有专人管理的代销

点，以经销本学会会员和其他作者出版的东南亚书刊。

第五、支持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和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是我国新建的研究基地，它们本身拥有众多的研究人才和国家的财政资助，并有面向全国科研规划和课题招标计划，厦门大学和暨南大学的基地是我国大力加速发展东南亚学和华侨华人研究的支撑点，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的东南亚研究。我们深信，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和各地的研究机构都会对它们给予热情的支持和积极的配合，以便使中国东南亚研究由比较分散的状态走向相对集中，并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状态。

面向新世纪，中国的东南亚学研究的首要目标应是建立完整的东南亚学研究体系，并将我们的队伍建设成为一支具有国际水平与雄厚实力的研究队伍，这是一项光荣而十分艰巨的战略任务。这一担子将落在我们学会的全体会员，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肩上。

当代世界正处于科技革命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知识更新无比迅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断发展，各种新理论、新观点、新学说不断推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东南亚学界，必须增强紧迫感，而不能有丝毫自满与松懈；同时必须加强凝聚力，齐心协力地创造新的业绩。展望未来，我们信心百倍，我们深信，伴随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高潮，一个文化与科学发展的高潮即将到来，中国东南亚学研究的宏大目标必将在新世纪内由我们来实现。

[责任编辑：廖大珂]

“当代海外华人专题学术研讨会”简讯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 胡光元

由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主办的“当代海外华人专题学术研讨会”于11月16日-19日在我校顺利举行，国务院侨办和学校有关领导及国内外60余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围绕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就当代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这次研讨会分三个主题：华侨华人学科发展研究；当代海外华人与居住国民族关系；90年代以来海外华文教育的变革。与会的专家和学者密切结合当前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发展动态，总结了近年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热烈探讨了这一学科研究的最新进展，研讨会受到了与会专家和学者的一致好评。

[责任编辑：廖大珂]